

【语言文学艺术研究·朝鲜古代文学专题研究】

朝鲜文人权斗经《次〈感士不遇赋〉》与
陶渊明《感士不遇赋》之比较

杨 昊

(延边大学 中文系, 吉林 延吉 133002)

摘 要:陶渊明对古代朝鲜文学影响颇深。朝鲜文人权斗经的《次〈感士不遇赋〉》,按照陶渊明《感士不遇赋》的原韵、原字和次序相和而作,且部分语句和思想化自陶渊明的《感士不遇赋》,也有部分语句反用其意,表达的意旨和《感士不遇赋》不同。《感士不遇赋》通过对天道、人事的分析,得出不遇是文士的宿命,表现出陶渊明归隐的理性与彻底。而《次〈感士不遇赋〉》则是权斗经兼济天下而不能的不平之鸣,其意旨最终仍在于仕进,表现出的仍然是积极用世之心。

关键词:权斗经;《次〈感士不遇赋〉》;陶渊明;《感士不遇赋》;辞赋

中图分类号: I 312.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86/j.cnki.1673-2618.2014.02.024

陶渊明以其“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安贫乐道、耿介悠然的隐士形象,高洁独立、卓然超群的人格魅力以及“笃意真古,辞典婉惬”^[1]的文学作品,在中国古代文人心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和巨大的影响力,历代都不乏对陶渊明及其诗歌、散文、辞赋作品的歌咏唱和之作。陶渊明似乎成为中国古代文人的一个精神寄托,古代文人在现实中不得意之时,往往在陶渊明的精神境界中寻找安慰与寄托。其实,陶渊明不仅仅影响着中国古代的文人与文学,他也深深影响了古代朝鲜的文人与文学。

古代朝鲜作为汉文化圈中的一员,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学习具有悠久的历史。两千多年以前,汉字就传入了古代朝鲜,在三国时期(前57年—668年,高句丽、百济、新罗),古代朝鲜就出现了“太学”这样的教育机构,教授中国儒家文化,中国的五经等文史典籍也都相继传入朝鲜,成为朝鲜文士学习的对象,中国文化已经逐步在古代朝鲜传播开来。到了高丽朝时期,朝鲜更加注重学习中国文化,并

模仿唐朝的科举取士制度,促进了高丽朝中国文化的高度普及。到了朝鲜朝,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更是达到了繁盛阶段。

陶渊明的文学作品何时传入朝鲜,并没有明确的时间点。陶渊明生活的年代,正处于古代朝鲜三国时期。当时,中国和古代朝鲜的文化交流就已经比较频繁。据《旧唐书》对高句丽的相关记载:“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冬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扁堂,子孙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曄《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众之。”^[2]而《文选》中收录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挽歌诗》《杂诗二首》《咏贫士》《读山海经诗》《拟古诗》《归去来并序》这些作品,并为陶渊明作了传。可以说,陶渊明的作品在高句丽时期就已经传入朝鲜,随着之后中朝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由昭明太子所编的《陶渊明集》必然也传到了朝鲜。从现有资料来看,最晚在朝鲜朝中宗十七年(1522年),就已经有活字版的《陶渊明集》在朝鲜流行于世了。

收稿日期:2014-02-11

作者简介:杨昊(1990—),男,湖北宜都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中朝古代辞赋研究。

E-mail:haoyang0310@126.com

陶渊明在中国受到了诸如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朱熹等诸多士人的喜爱与推崇,在古代朝鲜也不例外,他得到了古代朝鲜文人的推崇。且不论陶渊明的诸多诗歌作品,仅就其《归去来兮辞》《闲情赋》《感士不遇赋》三篇辞赋作品而言,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以《归去来兮辞》对朝鲜文人的影响颇大。从高丽朝文人李仁老的《和归去来辞》开始,之后对《归去来兮辞》的酬唱之作竟达400多篇^{[3]15}，“韩国汉学家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表达其对陶渊明的仰慕效法之情。一是集《归去来兮辞》字而成诗,二是以诗体表达读后感,三是依其韵而赓和之。”^{[4]227}陶渊明的三篇辞赋作品中,《闲情赋》的风格和陶渊明文学作品的整体风格有些不同,其所要表达的到底是真切的爱还是借楚辞“香草美人”的比兴寄托的手法表达其对政治理想的追求还是一段公案,尚无定论,因而少有唱和之作;虽然《感士不遇赋》(以下简称《陶赋》)在艺术性和影响力方面不及《归去来兮辞》与《闲情赋》,但它表达出了千古文士一致的心结——如何面对“士不遇”的问题,因而也有很大的影响力。朝鲜朝后期文人权斗经就作了一篇《次〈感士不遇赋〉》,虽然古代朝鲜对《感士不遇赋》的拟次之作仅此一篇,但是比较二者的异同,对于比较古代中朝文人对“士不遇”这一现象的不同心态与看法不无意义。

二

权斗经(1654—1725年),字天章,号苍雪斋,籍贯安东,朝鲜朝后期文人。他是朝鲜朝忠定公权穰的第五代孙,祖父是权硕忠,父亲是权濡。他是朝鲜朝性理学家李玄逸的门人,同时和大儒李载等人交好。1675年司马试合格,进入成均馆。1694年1月,成为泰陵参奉,同年4月因为“甲戌换局”(朝鲜肃宗由张禧嫔转宠仁显皇后,“西人党”再次掌权)的斗争,权斗经被流放到了永平梁门驿。1696年6月,任司饔院的奉仕官。1698年,历任高阳、金浦苇鱼场监,在任期间扫除积弊,渔民给他建了去思碑。当年7月,晋州、昆阳取士官,他当选,并在光阳葛隐里和李玄逸见面并且一同游览了蟾江。1699年6月被选作佐郎,1700年春升为正郎,赴任灵山县监,大大教化了那里的风俗。1703年,在道内和畏斋、复斋等人一起建立书院,后受到批判而被流放。1710年科举应试文科合格。1711年成为国子直

讲。1712年3月成为正言,因为年老而没有赴任。5月发生白虹贯日之变,权斗经呈上万言疏,指出了时政的错误与积弊。1717年岭南的一万余儒生上书时就是以他的上书为基础的。1721年成了高山察访。1723年12月,因副修撰而兼致知教。因为年老没有上任,上疏陈述所怀,内容犯了当时的忌讳而受到批判,并受到柳岩、李以济的疏斥。1724年成为素参。他进行上疏,因为李光佐讨逆,被弹劾。这个上疏受到了批判,以不敬之罪被诽谤。4月被罢黜,流放到清凉山。1725年3月权斗经病逝,6月在奉化系大鸟山举行葬礼。去世后,李光廷给他写了墓志铭,柳致明写了祭文。权斗经的文章很优秀,特别善于作诗,并且在时局变化和政治的得失等方面具有锐利而独到的眼光。权斗经去世后,他的儿子权暮和侄子权万以及其他曾经的挚友密庵李载等一起对他的作品进行了整理,留有《苍雪集》《退溪先生言行》《陶山及门诸贤录》传世。其赋作有《次〈感士不遇赋〉》《反招隐酬李仲玉》两篇。

权斗经的《次〈感士不遇赋〉》在国内较少见,鉴于此,笔者根据《韩国文集丛刊》版本加以标点、分段录于其下:

后先生葢千载,挹遗芬之炳灵。超纷浊而淑邨,漠虚靚而遗名。追董马之攸叹,感不遇之鸿生。抚世变而兴咨,溯曩喆而抒情。

自混沌之既凿,纷巧开而机形。竟迍艰而知戒,畴蹈危而无惊。故远识之遥举,抗奇志于崑耕。惟含耀而匿智,羌混色而休声。视青紫之外华,譬日及之朝荣。彼俗流之夸毗,乃干没于名途。昧倾夺之互袭,谓恒保而长娱。俄延祸于赤族,奄絪名于丹书。亮灾庆之反复,递贺堂而吊闾。斯无责于嗜利,矧可期乎延誉。

嗟乎!道难持盈,人厌居上。邪或至丑正,诚不能胜妄。孤贞跼而寡和,众枉聚而兴谤。世不分于蒙闇,孰云保其高亮。

欵直道之难容,不复见旌别淑慝之世。伊君子之进修,诘澳涩而颓废?在遗逸而不怨,庶无媿乎柳惠。眷幽兰于空谷,气弥馥于居蔽。异勤怠于通塞,非喆士之攸计。謇董道而自饬,恒慥慥而竟岁。耻卢生之捷径,羞季子之游说。义自肥于水饮,乐不改于静界。苟

藏器而待时，穷与达其必济。或见可而弹冠，有色斯而拂袂。值舍车而贲趾，与白鸥而相亲。俟得舆而熙载，囿苍生而同仁。无肆侈于宦荣，岂陨获于贱贫。

终艰多而知寡，鲜遇主而致身。才难展于叔季，世已辽于轩辛。孟游齐而游梁，孔之郑而之陈。天生德而必用，何命途之险涩。纵废捐于一时，誓躬瘁而教立。启亿代之治平，泽万国之井邑。相骄王于胶西，舒罹忧于祸及。救降将而忤旨，迁蹈刑而怆泣。矧靖节之生晚，值颓景之将入。斯同感于异代，故意苦而声急。

载讽鸿词，长怀无已。难翦者变，不昧者理。或兴心于伤时，或抽志于悼己。想义熙之余韵，匪衣褐之为耻。悼天统之将移，惜邦乱之靡止。绎咏轲之深衷，重寄感于燕市。^[5]

三

次韵本是诗词创作的一种方式，要求按照原诗作的原韵、原字和次序相和而作。赋作为一种韵散相间的文体，对其次韵之作同样具有严格的要求。《次〈感士不遇赋〉》作为一篇次韵之作，就是完全按照陶渊明的《感士不遇赋》的原韵、原字和用韵次序相和而作的一篇赋。不仅在用韵、用字上如此，《次〈感士不遇赋〉》的部分语句和思想都是化自《陶赋》，但是，部分语句也有反用《陶赋》之意的情况，有的观念和《陶赋》也有所区别。下面，就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对《次〈感士不遇赋〉》加以分析，并和《陶赋》进行对比，比较其异同。

《次〈感士不遇赋〉》首段通过感叹陶渊明的千古美名开篇，联想到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和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为不得志的博学之士而感慨，感叹时光变迁、追想先哲而抒怀。这一段所表达的内容与《陶赋》小序“抚卷踌躇，遂感而赋之”相似，都是为了抒发感慨，引出“士不遇”的主题。

接下来，“自混沌之既凿，纷巧开而机形。竞迁艰而知戒，畴蹈危而无惊”。他认为自从天地形成以来，种种虚伪、机巧就都形成了，在这样一个充满机巧、欺诈的世界，没有人不惊慌失措。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出现了两类不同的人，下面分别进行了描述。从“故远识之遥举”至“譬日及之朝荣”是一类人。这一类人有高远的见识，在山中耕种，树立

不平凡的志向，隐匿自己的光辉和智慧，泯灭自己的言论和行迹，将那高官显爵外表的华美，看作早上开的木槿花一样转瞬即逝，是不值得追求的东西。从“彼俗流之夸毗”至“谓恒保而长娱”^{[5]10}是另一类。这些人是以谄谀、卑屈取媚于人的庸俗之辈，都在名利的道途中投机图利，贪图争夺而相互攻击，以为能够长久拥有并得到欢娱，而实际却是“俄延祸于赤族，奄絪名于丹书。亮灾庆之反复，递贺堂而吊闾”，福祸无常。但作者对他们的行为也表示了谅解，“斯无责于嗜利，矧可期乎延誉”。因为这类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去传播名誉。

以上这一段和《陶赋》比较起来，部分语句脱胎于其中，部分语句则与其相反。“自混沌之既凿，纷巧开而机形。竞迁艰而知戒，畴蹈危而无惊。故远识之遥举，抗奇志于崑耕。惟含耀而匿智，羌泯色而休声。视青紫之外华，譬日及之朝荣”脱胎于《陶赋》“世流浪而遂祖，物群分以相形。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山嶷嶷而怀影，川汪汪而藏声。望轩唐而永叹，甘贫贱以辞荣”，讲的都是世道衰微，人心充满“机巧”，因而一些有见识的通达之士便选择归隐，逃离纷乱的浊世。但是其中也有不同。《陶赋》认为上古之世是清明、美好的：“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稟神志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表达的是一种道家“万物随性”、自然而然的观点，表现的是上古社会的一种美好状态。而人类虚伪、狡诈、机巧的一面是由于远离上古，社会发展之后才表现出来的。而权斗经的《次〈感士不遇赋〉》则认为自天地开辟，各种机巧的一面便形成了，是伴随人类始终的。

“彼俗流之夸毗，乃干没于名途。昧倾夺之互袭，谓恒保而长娱。俄延祸于赤族，奄絪名于丹书。亮灾庆之反复，递贺堂而吊闾。斯无责于嗜利，矧可期乎延誉。”这一部分内容则和《陶赋》所述之意相反，是反其意而写成的。《陶赋》中“淳源旧汨长分，美恶作以异途。原百行之攸贵，莫为善之可娱。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表现的是行善之道，表现的是志士达人的做法，而权赋则表现的是世人为了名利相互倾夺、福祸难测的状态。

接下来,作者进一步感叹世道黑暗,善恶不明、忠奸不分。“嗟乎!道难持盈,人厌居上。邪或至丑正,诚不能胜妄。孤贞跼而寡和,众枉聚而兴谤。世不分于蒙闇,孰云保其高亮。”他认为天道很难保守成业,人却满足于身居高位。品行不正之人嫉害正直的人,真实还不能胜过虚假。孤直忠贞之人挺立而少有应和之人,许多邪曲小人集聚并发出诽谤之声。世道不加分别,幼稚而不明事理,很难有人保持自己的高风亮节。这一段内容和《陶赋》对应比较而言,可以看出其完全化自《陶赋》:“嗟乎!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二者都表现黑白不辨的浊世。其中,部分语句如“邪或至丑正,诚不能胜妄”则是完全化自《陶赋》。

接下来,权斗经对君子在浊世中该如何处世发表感慨,认为“欵直道之难容,不复见旌别淑慝之世。伊君子之进修,诘澳涩而颓废?在遗逸而不怨,庶无媿乎柳惠。”正道不被这世界所容纳,已经再也看不到那善恶分明的世道。但是君子进德修业、培养德行,怎能因为是处于浊乱之世而荒废?哪怕是不被任用、被遗弃也没有怨恨,要和柳下惠那样有操守的男子比起来也不逊色。这一段内容同样脱胎于《陶赋》:“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独抵修以自勤,岂三省之或废;庶进德以及时,时既至而不惠。”士人随时随地都应修养自己的品性,不能因身处浊世而有所荒废,正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在乱世中,更能显示出士人、君子的本色。

“眷幽兰于空谷,气弥馥于居蔽。”权斗经进一步发挥,以垂爱空旷幽深的山谷中的兰花比喻喜爱美好清高的品质。“异勤怠于通塞,非喆士之攸计。”在境遇顺逆不同时区别对待勤奋和懈怠,认为贤明之人的谋略也并非正确。这里,权斗经表达的“异勤怠”并非是指修身和品德培养,而是指“致仕之心”。在清明之时,要积极进仕,在浊乱之世则要怠于致仕,正所谓“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中庸》)。

“蹇董道而自伤,恒慥慥而竟岁。耻卢生之捷径,羞季子之游说。义自肥于水饮,乐不改于静界。”坚守正道,自行整饬,整年始终坚守笃实。以卢生为秦始皇求丹药这种取巧进身的门路而为耻,

为苏秦四处游说而感到羞愧。在一箪食、一瓢饮的清贫生活中守道自甘,心安而体胖,在平静的世界中坚守自己高洁的情操,不改其乐。“苟藏器而待时,穷与达其必济。或见可而弹冠,有色斯而拂袂。”希望隐藏才能而等待时机,不论穷困或显达都会成功。或许被认可而去为官,或许挥一挥衣袖,远遁以避世。“值舍车而贵趾,与白鸥而相亲。俟得舆而熙载,囿苍生而同仁。无肆侈于宦荣,岂限获于贱贫。”当文饰其脚趾,弃车徒步而行的时候,就和白鸥相亲近。等到得获庇荫,能够弘扬功业,管理苍生,一视同仁。在仕宦显荣中不穷奢极欲,在贫贱之中也不丧失志气。

之后,权斗经进一步感叹世事多艰,才能难以施展,自己已经远离了那个清平美好的世界。“终艰多而知寡,鲜遇主而致身。才难展于叔季,世已辽于轩辛。”然后,权斗经联想到“孟游齐而游梁,孔之郑而之陈”,以孔孟之不遇来自我安慰。但是同时他又想到,“天生德而必用,何命途之险涩。纵废捐于一时,謇躬瘁而教立。启亿代之治平,泽万国之井邑”。上天赋予的德性必须要加以运用,即使经历崎岖阻塞。纵然一时不被任用,也要鞠躬尽瘁去推行教化。开启万代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图景,使天下都受到恩泽。权斗经还是在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之盛事,希望能发挥自己的才能。但是权斗经受时代的局限,始终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所以他又联想到董仲舒、司马迁、陶渊明,认为和他们“斯同感于异代,故意苦而声急。”虽然权斗经认为他和陶渊明“同感于异代”,实则不然。

《次〈感士不遇赋〉》中的这一部分内容和《陶赋》一样,都运用了许多典故,且表达出“见弃则隐”的观点,但是细细品味,其隐的落脚点却都是“仕”,“隐”是迫不得已的行为,如“苟藏器而待时,穷与达其必济。或见可而弹冠,有色斯而拂袂。”“俟得舆而熙载,囿苍生而同仁。”“天生德而必用,何命途之险涩。纵废捐于一时,謇躬瘁而教立。启亿代之治平,泽万国之井邑。”他始终保持着“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哪怕是不能“立功”,也要“立言”而开教化以泽万国,这是何等雄心!

而《陶赋》则不然,“虽仅仅于必知,亦苦心而旷岁。审夫市之无虎,眩三夫之献说。悼贾傅之秀朗,纤远辔于促界。悲董相之渊致,屡乘危而幸济。感哲人之无偶,泪淋漓以洒袂。承前王之清海,曰

天道之无亲；澄得一以作鉴，恒辅善而佑仁。夷投老以长饥，回早夭而又贫。伤请车以备椁，悲茹蔽而殒身；虽好学与行义，何死生之苦辛！”所列举的贾谊、董仲舒、伯夷、颜回的例子都表达出对所谓“承前王之清海，曰天道之无亲；澄得一以作鉴，恒辅善而佑仁”的怀疑和控诉，发现所谓的进德修身以致仕都是徒劳，表现出对“出仕”的心灰意冷。天道不可信，国家社会又不能提供士人进身致仕的机会，在赋文的最后，陶渊明坚决地选择了“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表现出其归隐的理性与彻底。而权斗经则还是在感叹“悼天统之将移，惜邦乱之靡止”，为朝廷和国家忧心忡忡。

四

由上面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权斗经的《次〈感士不遇赋〉》在用韵、用字，乃至部分语句均和《陶赋》相同或相似，而实则二者的精神指向则完全不同。

《次〈感士不遇赋〉》的“感士不遇”在于追求“遇”，赋作是对己之不遇的哀怨与宽慰，“得遇”而能成就“治国、平天下”的大业是其追求，始终表现出的是一位文士积极进仕的心态。而《陶赋》则是通过列举从古至今的不遇之人的理性分析，认为积极进仕在浊世之中是徒劳，于是彻底选择了归隐，表现出一种真挚与洒脱。

古代朝鲜辞赋中，表达不遇情怀的赋作非常多，并且基本上都是表现不遇之哀怨，希望能够得到赏识，去完成自己的“经国大业”，鲜有陶渊明般的洒脱与透彻。如朝鲜朝前期文人郑希良的《梧桐》，就通过叙写与梧桐的对话，将梧桐同桂、椿、松、竹等作对比，询问梧桐为何而生，并以作者胸中所想来代其回答，表明万物各有其特色，重要的在于存在价值能否被他人挖掘与赏识。该赋借梧桐等待巧匠工倕，表达了作者自己渴望遇到知音，渴望被赏识，进而为国效力的心志。李荇在《问津》

参考文献：

- [1]钟嵘，诗品注[M]，陈延杰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 [2]刘昉，等，旧唐书：第16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3]南润秀，韩国的和陶辞研究[M]，首尔：亦乐出版社，2004.
- [4]曹虹，中国辞赋源流综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5.
- [5]权斗经，苍雪集[M]//韩国文集丛刊：169辑，汉城：景仁文化社，1996.
- [6]于春海，古代朝鲜辞赋解析：第1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中，借孔子“问津”这个典故，表达了自己和孔子一样怀才不遇的心情，但是作者并不因此而退缩，而是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为改变那种混乱黑暗的局面而努力。许筠的《北归赋》通过描写作者被罢官之时北归的所见所感，自拟美女，叙述了因他人嫉妒自身才华而受到排挤和抛弃的哀怨，感叹自己难与世合、怀才不遇的苦闷和怨恨，同时在赋中隐约表达了自己仍想有所作为的意愿。^{[6]118}

古代朝鲜辞赋中，上述这样表达自己不被赏识而任用、却更加坚定信心要积极进仕的赋作特别多，这与中国儒家思想对古代朝鲜的影响之深密切相关。仅就权斗经而言，他所生活的朝鲜朝后期党争不断、政治腐败黑暗。从他的生平可知，他出生在官宦世家，从小接受了良好的儒家思想教育，与很多当时有名的性理学者交好，因而儒家经世致用的观念深入其心，成为其终生信条。权斗经虽然仕途经历颇不平坦，多次遭遇贬官流放，即使是出仕，也大多是国子直讲、正言之类没有实权的小官，但他却仍然积极求仕，并且在任职期间尽心尽职，积极践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去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这都来源于儒家思想的指引与支撑。而陶渊明的抱朴守真的情操与诀别官场的洒脱，则大多得益于其道家思想的影响。陶渊明早年进仕时期，践行的便是儒家之道，而到后来选择归隐，一方面有儒家“无道则隐”的因素，更有道家“悠然见南山”的返璞趣味。

总之，《次〈感士不遇赋〉》作为《陶赋》的次韵之作，在用韵、用字上都严格依照《陶赋》，部分语句上采用相仿和相反《陶赋》文意的方式，表达出兼济天下而不能的不平之鸣，但是其最终意旨仍在于进仕，表现出的是用世之心，这与《陶赋》所表现的对官场诀别的坚决与归隐的洒脱大异其趣。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在于权斗经根深蒂固的积极用世、修齐治平的儒家思想有异于陶渊明晚年出世归隐的道家思想趣味。

(责任编辑：许金)